

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血洒吕梁山的民族英雄刘志丹

红军东征坪上渡，三交长留志丹魂。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中阳县（今柳林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33岁。毛泽东为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其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柳林县在三交镇鏊子圪垯上修建了一座刘志丹将军殉难纪念亭并塑一尊雕像。在吕梁山革命博物馆珍藏着刘志丹在红军东征

时期使用过的长条凳，它见证了刘志丹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坚强意志，始终不渝、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坚韧不拔、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刘志丹（1903—1936），名景桂，字子丹、志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历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第28军军长等职。刘志丹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96年，刘志丹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刘志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追求真理 救国救民

刘志丹从小生活在旧中国贫瘠落后的陕北，亲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之凄惨景象，对社会黑暗境况十分不满。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他阅读进步书籍，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压迫，立志救国救民。

1922年，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受到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等革命进步书刊，日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1924年冬，刘志丹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

产主义者。他说：“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底。”

1925年秋，刘志丹被派往广州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先后进入步兵科、炮兵科学习，10月毕业。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各地组织起义暴动，在陕甘两省边界地区建立起红色武装，成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斗争领导权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

发动起义 创建根据地

1928年5月，刘志丹同唐澍、谢子长领导渭华起义，成为我党在北方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同年冬，刘志丹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鉴于当时陕甘地区各派军阀的争斗与扩张形势，在陕北特委会议上，他主张“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之重要思想，这就是以“红色”“白色”“灰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武装。他大胆设想的“三色论”，既要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也要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还有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这一主张为我党创建人民军队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他将这一创建军队的理论成功付诸实践。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采取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实践证明，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开辟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巩固根据地；只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革命斗争才能有所依托。

1930年9月，刘志丹组建起一支100余人的南梁游击队，拉开陕甘边区武装斗争之序幕。



刘志丹使用过的长条凳（馆藏文物）

率部东征 血洒吕梁山

1936年3月底，刘志丹率领红28军参加东征，挺进晋西，连续重创阎锡山部队。4月，刘志丹和宋任穷率部东征驰骋山西。4月13日，接到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联名电报：“28军有相机消灭三交镇、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恢复黄河交通之任务。”他不舍昼夜，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中，他在阵地前沿察看敌情时，发现敌人在远处小庙旁的碉堡内不断用机枪扫射，战士们数次发起冲锋，都未能成功，且伤亡很大。就在他准备调整部署、集中力量攻打碉堡时，敌人突然从碉堡内猛烈扫射过来，猝不及防，刘志丹不幸左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战士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6支缴获的香烟。

毛泽东获悉刘志丹牺牲消息后痛惜地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后来，又在干部大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刘志丹十分重视军民一致、官

兵一致等重要建军原则，强调爱民、爱兵。他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关心群众疾苦，深受官兵和群众拥戴。他牺牲后，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193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为他举行追悼大会。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刘志丹将军移陵公祭典礼。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为他亲笔题词赞誉，这都代表了党和人民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崇高评价。

刘志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刘志丹是“对民族，对人民无限忠诚，和群众亲同骨肉”的代表，是“英勇善战，百折不回”的代表，是“实事求是，随时随地都能发挥创造性”的代表，是西北人民的一面胜利旗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模范党员。红军东征在中华民族解放历史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军东征民族英雄刘志丹血洒吕梁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共产党人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渝的崇高气节和伟大精神，将永远激励吕梁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砥砺前行！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高宇峰提供）

□ 袁志钊

重温《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1948年3月24日，毛泽东从延安东渡黄河来到晋绥，4月2日在晋绥边区首府吕梁兴县对《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的编辑人员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即《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谈话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党的新闻事业的使命任务、功能作用、指导方针、工作原则、报道策略与方法，以及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其思想内涵极为丰富，成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走向成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

在谈话开头，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指出了党的新闻事业的使命任务，“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他强调，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在谈到如何办报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这一“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为党的新闻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影响下，《晋绥日报》诞生了常芝青、甘惜分、纪希晨等一批在新闻业界和学界著名的新闻人。他们曾在现场聆听谈话，并将思想的种子带到各自后来的新闻实践和学术研究中，推动了我国新闻事业、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上，《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人唯一一次到一家报社编辑部发表谈话，是毛泽东新闻论述中的力作名篇，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进入成熟时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

